



中國災荒問題之考察

徐宗士

一人間的地獄

全

國遍地的饑荒、食糧的缺乏、和穀價的奇昂、已使賑濟平糶的呼聲，微響了雲霄；然而常在豐衣足食中過着優美生活的人們，也不能感覺到民食的急迫與災況的嚴重。試一檢最近的報紙，誰能不關懷到遍佈各省的災民，那已斃待斃的災民！

華洋義賑會據陝西蒲城縣支會報告：全縣赤地無涯，純是荒枯野草，饑尸滿道，致人無力撫葬，悉爲犬食鳥餐，蒲城西門外皆掘萬人坑，所有死尸，皆擲於坑中，現數丈之坑，已經填滿，死亡之多，無從查悉數目。……又中國濟生會據陝災主任報告：……萬人坑中加高泥土，滿布灰膠築，以免屍得春氣，犬獸抓開，穢惡上升，傳染疫癘

；此種慘狀，直如餓鬼地獄現象。……

賑委田傑生自太原來電：……吾人甫入陝境，即覺凄慘

陰森，一片死氣，接於眼簾者，非鳩形鵠面之災黎，即縱橫狼籍之屍體；觸於耳鼓者，非啼饑號寒之哭聲，即呻吟待斃之哀鳴；行於鄉輒數十里不見人烟，雞犬之聲無聞，入於市惟見斷垣殘壁與瓦礫荒墟而已。蓋過歲以來，富有者大都破產，中等之家，類多淪爲乞丐，貧寒者量已死亡殆盡矣。東西道上，扶老携幼遷徙逃生者，絡繹不絕，婦孺之被賣出境者尤多如過江之鯽。閭閻之間，多已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求生不得轉速求死，墜井投崖，不一而足；甚有隱藥於食，毒斃全家者。以故死亡速率，日益加劇，所謂萬人坑者，每縣必設，積無數餓殍，棄置而納諸一坑，並裹屍之席亦無之。……

西北災情視察團員談武功縣之亞柏鎮，有人市女子，最高價八元，其他各縣大抵如此；永壽縣之絲軍鎮，自去歲迄今，設有人市，計前後被外省人販以二十元至三十元之身價買去已嫁及未嫁婦女，已達六千人以上。又訊，某縣三饅頭可市得青年女子一人。

視察團報告：興平全縣十七萬人，日死數百人，田價每畝二三元，尙無人買；武功縣則田價每畝僅五角。

至陝西被災區域，據田傑生報告，全省九十二縣，無處非災區；除沿渭河各縣，略見青苗外，餘均滿目荒涼，盡是不毛之地。面積廣狹，約達五十餘萬方里。被災人數，陝西全境共九百四十餘萬口，去歲迄今，被災而死者，二百五十萬，逃者約四十餘萬。現存六百五十萬，急切待賑者須在五百萬人以上。

陝西是西北災荒最重的一省，然而其他各省的慘況，也並不稍減。

綏遠通信：綏遠近三年來，凡人世間所有之各種天災人禍，除蝗蟲外，無一不有，無一不重。……最近調查大災後死亡總數至少在二十萬人以上，婦孺被賣出境之數目雖無統計，然即以此項兌款論，亦有一百五十萬元之巨。……綏遠共有七千村，每村人口，雖云多寡不一，但現在每

村至多祇有數人或十餘人，而婦孺尤不易得，大有人荒之患。

河南通信：此次旱災，豫省以西南爲重，豫南以南陽爲最；延綿數百里，災情略同。南陽一縣，災民達四十萬，現無衣無食者，居其大半；存糧能過寒冬者，百不得十。

田傑生電告山西災情，久旱爲主，佔百之七十餘；逃者三萬人，被賣者萬餘，秋收只二成。又大同通信：全省幾成無處不災，就中尤以河東雁北各縣爲最酷。人民啼飢號寒，草莖菜根，羅掘殆盡；木葉樹皮，採剝無遺；鬻妻賣子，……災情之重，爲近數十年來所未有。

這些西北的災況，想我們都早注意到，無庸再加縷述。這裏所舉的，不過是極少數的表徵。但是這樣的慘狀，已不復局限於黃河流域，而已蔓延於南部各省。那素稱富庶的江浙皖，也注以同樣的命運：

安徽通信：本年夏秋之交，皖省旱潦兼告，其中尤推合肥受災最重。又據皖省合肥旱災籌振委員會電：……有地皆赤，無草能青；四境膏腴，竟成焦土；崗圩齊荒，古所罕有。

旅滬鹽城救災會呈賑災會文：連年災歉，今歲尤甚，其災情之慘，爲從來所未有。……

浙江溫屬災況，以永嘉爲最重；全縣被災十二區，戶四十五萬。災口十四萬八千七百餘，災田二十一萬七千三百餘畝。如果我們不看累牘的記載，而單就上海泰晤士報所載溫州通訊一則，已可見其慘狀：「溫屬災情愈顯嚴重，貧民多自盡以免饑寒之苦；聞嘉牛街（譯音）有一飢餓難忍者，自噬其手之肉，暴痛而死。」

江浙的蘇杭，向來是比擬於天堂的，然而終究免不了那災神的降臨。據調查吳縣被災田畝，約七十餘萬，洞庭東西兩山災情尤重，顆粒無收。浙江今年被災達五十餘縣，杭縣自不能獨外。理想的天堂，竟也變成了陰慘的地獄！以上通信及調查，俱引自京滬日報及中央週報農業週報等所載。

二 災況一般

從以上的敘述，我們的腦筋中至少可以印有悲慘森酷的概念，至少足以反證那所謂優美的生活純是夢幻。但在統計缺乏的現代中國，對於整個的災況，是不容易窺得全豹的。然而如果我們更深刻地認識災荒問題對於中國的重要性，自不得不有賴於完備的統計和報告。國民政府賑務處過去的調查（十八年二月製）足資我們的參考。據該調查全

國被災區域達二十一省，內共一〇九三縣四市。災民除湘蘇黔川閩熱贛七省未報外，已有五六·六二二、五〇〇人。連同上述七省至少有七千萬人；即全國平均每六人中即有災民一人。災區之分佈如下：

省別	被災縣市	災況	災民數	備考
甘肅	六五	旱霜匪	二、四四〇、八四五	外有長安等七縣災民未據調查尚未列入上項災民數內
陝西	八五	旱蝗疫	五、三五五、二六四	
山西	八六	風兵匪	六、〇一七、八九七	
綏遠	一七	旱地震	一、四九八、八一七	
河南	二二	同前	四、〇一一、六六六	
山東	八三	水蟲日	五、〇〇〇、〇〇〇	
察哈爾	一六	旱霜	三、〇八八、四三二	
河北	七一	旱水火	六、〇〇〇、〇〇〇	
廣東	五九零一市	山崩雷	一、二七一、八〇七	分有新豐等十一縣及廣州市災民未據列報尚未加入上項災民數內
安徽	四一	旱風水	五、四六一、八八二	
湖南	五一	大旱水		災民人數未據列報無法填註
浙江	三三	水風虫	七〇〇、〇〇〇	
廣西	四九零一市	旱蟲水	三、一六一、一三五	
江西	六九	同前		災民人數未據列報無法填註
熱河	一五	旱霜水		災民人數因災區遼闊尚未據查明故付闕如
雲南	五三零一市	震霜水	三、四四四、二七五	

四川	五四	旱水	災民人數未據詳報故闕
福建	三一	兵匪	被災者據調查約十萬六千三百七十餘家
貴州	五四	電水大旱兵匪	災民人數未據詳報無法填註
江蘇	四	旱蝗兵	查該省災表尚未寄到故災民人數無法填註
呼瑪		水災	

此調查大概還是去年的災況，並不怎樣的完備。而且所謂「災民」，也並沒有嚴格的規定。即以陝西論，據最近報告（見前）災區已遍全省（九十二縣），而此調查僅有八十五縣，如將死亡逃出者與急切待賑者併計，當有八百萬人以上，此表則僅有五百餘萬。浙江被災區擴至五十餘。湖南據長沙通信，全省亦俱被災，除醴陵等縣受災，常德等縣未報外，其餘大庸等四十三縣災民約數，各在十萬二十萬上下不等，全省災民估計當在五六百萬人以上。青海表中未列入，需賑亦甚殷。故實際上災區及災民數當超過該調查的估計。即謂中國現有災民一萬萬，亦非過甚之言。全中國人口，如據陳長衡氏估計為四七二、〇〇〇、〇〇〇（民國十七年），或據郵局估計為四八五、〇〇〇、〇〇〇，則平均每五人即有災民一人。如每戶平均以五口計算，則可謂每戶即有災民一人。

今年全國的收成，據立法院統計處最近根據一千另七十

五鄉村農村報告員之農況報告，將各省收成百分數估計如下：

省名	小麥	大麥	稻	大豆	玉米
黑龍江	九九·八	八九·一	八四·八	八四·三	九九·九
吉林	九九·八	六〇·六	一〇〇·二	九六·七	九九·九
遼寧	一〇四·三	一〇〇·八	九七·五	一〇三·八	九九·六
察哈爾	八五·〇	一〇〇·三		四二·一	五四·九
綏遠	一〇四·五				八〇·〇
陝西	五五·一	四四·五			四八·二
山西	八三·九	七九·〇	七九·一	九三·六	九〇·二
河北	八一·二	九七·六	八一·二	一〇七·四	九九·六
山東	七九·六	八五·七		一一四·六	八三·七
河南	三八·六	二八·二			一〇〇·一
江蘇	五七·一	八一·八	九八·一	八七·九	
安徽	七六·〇	七三·六	一〇五·三	九五·五	
浙江	八二·二	一〇〇·〇	四〇·四	五三·八	五四·二
湖北	八九·一	九六·六	七七·〇	七四·七	七九·七
湖南	一〇〇·〇		九一·五	一〇〇·〇	八〇·〇
江西	三三·六	八八·一	五五·一	八九·六	
四川	一〇〇·〇		八九·九	七四·〇	
雲南	八八·〇		七二·二	八五·九	八七·三
貴州	一〇〇·〇		九一·五	一〇〇·〇	
福建	一二四·〇	二八·二	六〇·〇	一〇五·〇	
廣東			七二·〇	七六·四	
廣西			六五·九	九六·二	八五·〇
全國總平均	八〇·八	七九·二	五七·九	九九·七	九八·九

（註）——表示未詳或不生產

這報告所及範圍為二十三省四百五十縣，而災情很重的

熱河甘肅新疆諸省區，則付闕如。又二十三省中之東三省實際上在日人經營下墾植，情形不同，不能並論，而且事實上在災區之外。再次，此種調查係用抽象方法，就有報告員之一千多鄉村的收成綜合而成。這些報告員大概是，不會在饑屍遍地臭氣上升的地方調查的；而且赤地千里，日無收成可資調查。所以全國收成的平均數，比上表應大為減低。誠如胡漢民先生在中央紀念週中所說：「統計起來，全國還不到五成的收穫。」

至於為連年災荒所用的賑款雖沒有估計，但如去年發行一千萬的賑災公債，以及國內外團體私人所募的捐款，其數目當甚可驚。我們祇要一看各報上連篇的乞賑囑謝等廣告，就可想像其巨大。

三 回溯與推量

這樣駭人聽聞的普遍的災荒，在中外歷史上實無與倫比。本來，自古以來，饑荒幾乎已成爲中國常有的災禍。

據金陵大學學生農事研究會的報告，在紀元前一〇八年與紀元後一九一一年之間，中國曾有過一八二八次的饑荒，換句話說，幾乎在每一年裏，中國的十八省內，總有一省會鬧饑荒的。「在目下中國人底腦海裏所能追憶的災情最

重的一次饑荒，是在一八七六——九年間。……在這三年裏，在山西、河北、河南和山東底一部分，竟然毫無雨水。據華洋義賑會底報告說：在這一次的空前巨災裏，因受饑餓、疾病和強暴之侵迫而犧牲的中國同胞，竟有九百萬到一千三百萬之多。」(Walter H. Mallory 著饑荒的中國吳譯三頁)「在西元一九二〇與一九二一年之間，中國的北部，曾發生過一次極大的旱災，據可靠報告，這次共死了五十萬人。……當災况最嚴重的時候，差不多有二千萬人，完全陷於無衣無食的境況之下。」(前書引言三頁)然而像近幾年來這樣地整百萬的死亡，整千萬的嗷嗷待哺，這樣的普遍蔓延於全國，無疑的是空前的浩劫。

但是，最大的危機，決不在這一次災區的廣大、災况的嚴重，如果這不過是偶發的情事，不過歷來災荒週期的表現，那至少可預望災况之遞減以至於無。然而最可怕地展開在我們的面前的是：災荒之成爲慢性病，災情的延長擴張，和「更大之災」的繼起。這些象徵，我們可以很顯明地從報章上觀察：

觀察團通信：本年陝災雖重，死人雖多，而未災之災，恐將愈重，死人恐愈多；因本年全省統計，秋收尚有十成之二，目前全省各麥之播種者，不足十份之一，來夏無收，已成不可避免之事實。兼以死屍載道，掩埋無人，來春瘟疫，其勢必盛。是以明年春夏之陝災，獨較本年之

災爲可慮也。

田傑生通電：今時已入冬，二麥尚未下種，故此後災情，已轉入於更重時期。……夫大災之後，繼以更大之災，益以交通梗塞，無從救濟，然則日暮途窮，陝民將同歸於盡矣。

渭池北鄉土人云：現值種麥時期，無錢買種，無牛耕田；眼看來春收成，又將失望。

洛陽信：秋收無顆粒，明春春麥至今尚未播種，民食無望，致成奇災。

在此，我們可以想像到更大的災況的到來，可以預料着災荒的「擴大再生產」的實現。問題決不是一時的，而將延互至長時間；不僅是目前的，而且兼及將來；決不是單純淺易，而包有極度的複雜性和深遠的根底。要了解中國革命的客觀環境，對此應作分析的檢討。

四 一般所謂災因

開始，我們對於災荒的定義，不能如華洋義賑會所下之狹：

「災荒爲食糧供給之失敗，其根本由於自然的各種原因。」

因此，我們對於災因之探討，是一般的、廣義的、而並不限於天然。

各省災荒的原因，在上引賑務處的調查表，可以窺得其大概。這些原因中，除了山東被日軍的焚殺和最近東北邊境之被俄軍蹂躪，是非常的事變，不能作爲饑荒的原因以外，不加思索地可概括爲：一般地是由於天災，小部是由於兵匪等的人禍。然而如果我們再作分析的考察，就可發見在這樣的大災荒中，人禍對於天災所占的比較地位，和普通腦海中的想像相較是怎樣？

田傑生通電：年來大兵雲集，供應繁重，民間積蓄，搜括淨盡，即無天災，人禍已足以病民。我人於此，敢斷言釀成西北奇災之兩大主因：厥惟多兵與久旱是已。兼之伏莽遍地，劫掠燒殺，……似此天災人禍，紛至沓來，……

視災國通信：陝縣災情，共分三種，匪災居十分之四，兵災居十分之三，天災居十分之三。又訊：陝西成災之原因（一）甲、陝中樹木，爲歷年軍隊砍伐殆盡；乙、長安以西歷年爲軍隊強迫栽種鴉片，而農田既種鴉片後，地質即成枯瘠，一遇兇旱，收穫全無；（二）軍出潼關，糧秣猶賴陝省供給，因此積糧盡出，戶鮮蓄藏，軍退，交通中斷，外糧無由入關，猶須增加軍糧之負擔。

于右任氏談話：津浦瀋海兩路，各車站糧食，堆放如山，無車西運。……而陝人死亡日甚。……

上面的引例，雖是偏於西北尤其是陝西的，但我們至少得到一個災因的概念；而且這些情形，固不單是西北所特

有，到處都是一樣。我們在此地，可另舉一個綜合的引證：不久以前，美國在華紅十字會曾對美國中央委員會作了報告；在這報告中，該會列舉災因，結論是中國「饑荒」一字之意義，與應用於他國時絕異。西北各省之災情並不是由天然原因所釀成的食糧供給缺乏的結果。『在這些情形下，外國救濟機關，鮮能爲力，因此該會亦無向美國人民呼籲之必要。』報告的原文甚長，其大意可以從下列的專電中觀得。

十八年九月二十九日北平專電：歐美對賑災款項，一致停募。因紅會調查報告災因，一爲軍隊徵發糧食；二爲土匪劫掠；三爲苛稅；四爲內戰。遼至人民絕食；計陝甘豫鄂湘夏察綏七省，已餓死三百萬人以上，若放賑僅六點鐘之效力，無濟於事；且有民間子糧爲軍隊徵去，故無從下種，此非天災，不受人憐云。

又密勒氏評論週報載該報告中所述中國饑荒的主要原因有七：不斷的內戰、運輸之破壞、遍地的匪類、苛稅、交通工具的缺少、無與倫比的過剩人口、及水旱蝗蟲等的天然原因。

這一個報告，自然引起重大的影響，同時招致各方的抨擊。但是普通的批評，都着眼於其對於人爲原因的過分重視和天然原因的忽視。或者抨擊其不應因上述原因而停止助賑。但對於彼所舉的災因，都無法否認。至少，這些人

禍所造成的災荒，不在天災之下。至少，這樣普遍的慢性的災荒，爲經濟進步的國家所未有。

Molory 在其所著飢荒的中國 (China: Land of Famine) 一書中，分析過去飢荒的原因爲四種：經濟的、天然的、政治的、和社會的。將來的救治，也從此分別着眼。這四項，實際上仍可歸併爲天災與人禍。故一般所認爲災荒的原因，可以概括爲水旱蝗震風雹等的天災——其中尤以水旱爲多，和兵匪戰稅等的人禍。

自然，天災和人禍兩者間，並不是沒有關聯的存在着。Molory 就努力在這個不同的災因中找出共同的根柢。他在書末結論中，指示着：「致使中國變成一個饑荒惡神常臨之地的根本原因，是由於人口之過擠。」如果將自身底人口問題，置之不問，而聽任自然底處置時，則中國以前和現時所遇到的一切慘狀，將來勢所必然地要在目下認爲興盛的地方，重複表演的。」(吳譯二六三頁)他這樣的斷言，與中國人口問題的悲觀派的見解相當。他們以爲中國的過剩人口，常使食糧有不足之虞，如農田因天災而歉收，則食糧更發生巨大的恐慌。人口過剩和食糧不足的結果，使人民陷於「困窮、飢餓、疾病、戰爭」，使一切的人禍伴隨而起，終使全國遍地的大災荒連年不斷的發生。

然而他們這樣機械地應用馬爾薩斯的人口法則，來認識中國災荒的本質，終究他們是否洞察其真相和深得其根柢，是一個疑問。

我們要認識中國災荒問題是自然與社會之間的交互關係的問題；而且在牠底終極討究和根本的救治上，主要的不屬技術學的範圍，而是社會科學的領域。對於中國的災荒問題，不應加以機械的分離觀察，而當由其與世界全體的關聯而下觀察。不應與歷史上的災荒，加以同樣的靜的考察，而當在歷史的現階段中加以動的觀察。不把握中國社會的基礎，不把握現代中國社會的變遷，我們決不能在抽象中認識中國災荒問題的本質。

五 中國農業社會的基柱——水利經濟

要考究過去中國社會的根柢，不能不明瞭其與自然環境的關係。「人類生於自然之中，同時生於社會之中。」自然與社會間常結有緊密的關係。社會是在自然的基礎之上展開的。「外部的自然條件，是生產人類社會生活所必要的資料之母。」對自然力，加以社會的統制，加以節約，且以人類之手的工作去大規模的占有並馴服之，這種必要，在產業史上有決定的作用。」（引自向坂逸郎著人口理論陶

譯頁四六—四八。）尤其在經濟落後以土地為主要生產手段的農業社會裏，生產力的發展，特別是要依存於自然的條件。如何地去統制及駕馭自然，是這樣社會的主要的問題。在中國——凡是一切近東，中央亞細亞諸國都是同樣——大河流域是向來民族生息定居的地方，從而：「秩序整然的水利經濟是其死活的問題。水利經濟含有二種任務：第一是對於洪水的防衛，即江河的調節。中國的大河床，因為比沿流的溪谷的地平面還要高，所以這在中國更為重要。中國的河流在幾百年前增築了不知多少次的高堤。高堤間，比這還要高的流着，所以一旦堤防潰決，則其意義便是現在養數百萬人的地域立即變為湖泊。第二是灌溉設施，這是以中國的園圃式耕作為基礎；故其崩壞，在中國農業，實即是破滅。」（瓦爾加世界經濟年報，中國革命諸根本問題。）因之，在中國，防備洪水泛濫的工作和建立流通灌溉的設備，是社會底共同利益的焦點。「統御及調整自然條件，即河海底適宜與否，實為指示農業住民底安定與混亂之計度器。」能完善地統御和調整水流及灌溉系統，則農業生產力日形向上。生活資料的豐富，足使人民過安居樂業的生活。反之，如：「一旦失去自然條件底恩惠的保障，或無力去防止自然條件底盲目的作為，則農

業住民的生產物，漸遞減，社會內生活組織日趨紊亂；於是險象環生，社會頓呈不安之象。」

灌溉事業，在春秋以後，已成為中國農業的特徵。成效最顯的是秦國；這是使秦國統一諸侯的經濟的基礎。春秋戰國的時候，列國的互相攻伐，破壞了向來統一的治水工作和自然條件的調整，因此引起了農民對諸侯的背叛。反之，在秦國據河渠書所載：

西門豹引漳水灌鄴，以富魏之河內。而韓……使水工鄭國開說秦，會發涇水，自中山西邸鄠口爲渠，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欲以溉田。……渠就。因注壤關之水，溉澤國之地四萬餘頃；收告畝一饑。於是關中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彊，卒併諸侯。

灌溉農耕既須通河渠，於是封建舊制必得廢止，井田開成阡陌，以水利經濟爲基礎的中央集權的政治組織亦有成立的必要，因爲有了這個組織，而後才能統一調整灌溉并統一防衛整個流域的洪水。「中國的決定的生產力（即爲農耕所必不可缺的灌溉系統）之獨特的性質及統一調制此灌溉系統之必要性，是……中國官僚國家成立之物質的根柢。」（Wittfol: Das erwachende China 1926）因此，中國國家之職能，不與歐洲封建國家相同：「在中國，國家具有廣及全領域的重大職能——即全領域內米之配給的組織

化，全國最重要地方水利經濟之組織與監督。」（瓦爾加前引書）

這樣偉大的職能能否忠實完成，是歷來中國社會治亂的衡量計。水旱的天災的發生，就可從此找尋其根柢。

六 天災

中國古時有二大灌溉工程：其一是至晚清猶存的成都水利，其一是湮廢已久的渭北水利。成都水利有二千多年的歷史，包括面積甚廣，蜀用富饒，號爲天府。宋史河渠志：「蜀江之水，置堰溉田；旱則引灌，澇則疏導，故無水旱。」前清同治時德國地學家 Baron Richthofen 曾盛稱成都平原灌溉工程之完美，謂世界各地，殆無出其右。而關中則因渭北水利的廢弛，常遭旱災之患。據九朝東華錄載：有清一代各省之旱災，以四川爲最少，陝西省每百年平均有旱災九次半，四川省每百年尚不到半次。

水災方面，據竺可楨博士的統計，中國十八省從第一世紀到十九世紀，水災之次數以河南爲最多，共計一百七十三次，此乃由於黃河之故。蓋黃河決口大都在開封附近，自春秋以降，迄光緒十三年，黃河在開封附近決口有五十六次之多；其次爲河北省，共有一百六十四次；第三爲江

蘇省共有一百五十三次，此皆由於淮水與黃河氾濫之故。

在外觀上，水旱天災，似乎是中國歷來常有的現象，不足為怪。但是我們要深刻注意的，是：水旱之為患，在晚近愈多而愈烈；向來視為社會的突變，現在則視為常事。

據九朝東華錄所載，清代水災次數，河南五十、河北八十六、江蘇八十二；即二百多年中的水災次數，約占二千年（一至十九世紀）的水災次數的一半。而且我們可以斷定的，是清代末年的災數的比例，一定要比初年及中葉大。民國以來，黃河水災如民四決濮陽、民十決利津宮家壩、民十春開封封卹等處，河水氾濫，直魯豫三省，咸被其禍；民十四山東黃花寺黃河南岸決，災區一千五百方里，災民二百萬人；十五年東明南岸劉莊復決。淮河水災，如民十災區之廣，過於比利時全國；大災每六七年一次，小災每三四年一次。最近幾年的水旱災，則如一節所述，更不堪設想。

天災這樣加倍的加速度的來臨，我們不能認為是天降之罰。這是強暴的國際資本主義侵入的結果。國際資本主義之侵入，使中國脫去封建的外裳，踏上產業革命的過程。但是這個向資本主義的轉換，是在沒落的世界資本主義支配下的。因此，「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與歐洲適相反

對，在歐洲，資本主義是具有統一力的作用，在中國，却使其國家趨於瓦解，成為各位將軍的權力地域的狀態。」

（尤爾加前引書）政府內對外防禦之無能，遂失其封建的威權，同時又因各個帝國主義間利害不能一致，和社會變革期中所發生的過剩人口的活動（此點見後節），遂使內部的國家權力上發生分解的作用。這已足使統一地調整灌溉系統及排水體系——完成國家的職能成為不可能。加以國家的財源為帝國主義所榨取，政府更沒有餘力以繼續管理中國農業上最重要的水利經濟。於是如成都及揚子江下流等許多灌溉制度，因疏濬維持的統整的缺乏，日就廢弛；狹隘的運河，遂資為灌溉數百里的田地，西北區域之赤地千里，自不足為奇了。至對於洪水的防衛，本來惟有統一全個流域始能辦到；因軍事勢力範圍的劃定與重劃定，至多只能在河流的一部建設堤防，統一的堤防既無法成立，則他部分的潰決，自不能避免。加之軍閥戰爭時（如吳佩孚之於直奉戰爭）助以人工的決堤，水利工程之崩壞，遂成為必然的事實。最近雖有華北水利委員會、導淮委員會、揚子江水利整理委員會等的成立，但因財源的竭蹶和內戰的不息，其工作亦無成績可觀。近年的水旱天災，是上述原因之必然的結果。災況之日趨嚴重，是對本

帝國主義加重對中國的剝削和加速地破壞水利經濟之具體的表現。

註：據天南加馬道及一般人的意見，森林之砍伐，亦為水旱災發生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據一九一三年美國密西西比河之水利委員會會長湯生大佐在國家洩水會議發表之言論，以為造林不但不能防水旱之災，且反有害，至少亦不能謂造林之法，可以治河。此言論曾由中央大學專治水利工程之某君，節譯登於該校日刊，並斷言：「積經驗之所得，近數十年來已鮮有速森林之可防水旱者矣。」專家之言，當可信賴。故上面論證，將此略去。

水旱以外之天災，如地震風雹是各國都無法避免的現象；在中國的災荒中，也不占重要的地位，可略去不論。蝗災比較普遍，為害亦烈。江蘇蝗患，首推江北，而海州尤為產蝗最多的地方。這是因為海州荒地很多，「榛芒荒蕪，蘆葦萬頃，」蝗蝻遂得繁育於其間。據楊惟義江蘇昆虫局海州治蝗報告：產蝗之區，皆為荒地。這樣的蟲災，歸根到底，還是由於社會對自然之不能利用。

從上面的論證，我們可以這樣地斷言：中國水旱等天災的發生，是由於社會與自然間均衡的破壞——社會對於自然的統制與駕馭的無能。離開社會，只在抽象中考察自然，謬為創造天災的主宰，實陷於地理宿命論的謬誤。

這均衡的破壞，在近代以前雖常呈週期的表現，而自資

本主義侵入後，更為繼續的加强的暴露。因此，以前的累次災荒，常是長間隔的單純發現，而現則為緊接的擴大再生產。

七 人禍

以上，我們已經對於所謂天災，作完極的探討。其次，關於人禍的發生，因其呈現於我們的面前，比較明顯，在此，作簡單的說明已足。

一 自國際資本主義侵入中國以來，舊生產事業急激地崩壞，同時新生產力因受其強力的支配，沒有暢快發展的可能；於是在這新舊生產關係交替中，發生大量的過剩人口。

二 封建政治的剝削（苛稅、預征錢糧等等），在帝國主義侵略過程中，益形加重，下層農民日就貧困以致破產，助長過剩人口的造成。

三 「過剩人口是地方割據的根源，是內戰紛紜的條件。」過剩人口從事戰爭劫掠，於是有過剩人口之再生產。因此有農民戰爭，流寇橫行，軍閥交閥。（陶希聖著中國封建社會史）終則交通破壞，運輸阻滯，盜匪蜂起，紛擾無已時。

四 「資本主義的發展，把數千年來維持至今的中國土地營養分之均衡，加以破壞。連年不絕的內亂，使都市的肥料不容易運至田間，而兵火又破壞了有機物的成分。」（瓦爾加前引書）於是與灌溉制度相並為中國農業之第二基柱的肥料經濟，也被破壞。

五 軍隊之勒種鴉片，不但致地質陷於貧瘠，根本上使食糧無以自給。加以車輛家畜子糧等的徵發，使農民連極少數必要的生產手段都不能維持，戰時的損失，更不可計度。於是全國荒地面積以可驚的數目增加，從事農業的人口日漸減少，同時食糧的進口反年有增加。

這些因子，格外消極地擾亂社會與自然間的均衡——社會益喪失其統馭自然環境的機能。天災與人禍間又發生交互的影響，助長彼此的進展。

八 結語

中國的災荒，遂為這些交互影響的原因的必然的結果；

中國的災荒，是這些原因所釀成的社會經濟沒落的慘酷的反映。

我們不能如帝國主義的代言人一樣地無關痛癢，將各色各樣的災因加以臚列，因之也在各色各樣中找尋救治的方法。帝國主義本身，是造成、擴大、和延長中國近年災荒的終極的主要原因。我們本來就沒有由他們的假惺惺的慨助來救濟災民的奢望，我們也決不因他們的斷絕接濟而作弱者的悲哀與失望。

一般人所認為治標的救治，似乎因美國紅會的一紙報告，受着致命的打擊；而所謂水利工程等的根本救治，又急切不得實行。移民屯墾的擬議，也不能積極的進行。然而這樣嚴重地展開在我們面前的中國災荒問題，是必得解決的；這解決的關鍵，正與整個中國問題的解決的關鍵相同：中國災荒問題，是整個中國問題的一面。

十八年十二月十三日於南京。

